

近代云南人民爱国主义 和革命斗争史

(云南爱国主义丛书之一)



云南省历史研究所

1984年12月

上
《研究集刊》一九八四年第二期附刊

111
N6
436

近代云南人民爱 国主义和革命斗争史

(云南爱国主义丛书之一)

云南省历史研究所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P

1986, 4, 1.

本刊责任编辑

谢本书

王树五

云南省历史研究所 《研究集刊》1984年第2期副刊

编辑·出版：云南省历史研究所（地址：昆明市环城北路）

印刷·装订：云南新华印刷三厂 出版日期：1984年12月

期刊登记证：云出字第075号 定 价：每册 1.00 元

（ 内 部 刊 物 ）



目 录

云南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一大壮举

——“马嘉理事件”析……………孙代兴 (1)

早乐东驱逐英国武装测绘队……………桑耀华 (25)

纳西族的爱国主义传统……………和志武 (31)

云南近代革命斗争史略……………谢本书 (47)

云南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一大壮举

——“马嘉理事件”析

孙代兴

1875年春天，滇西边疆的景颇族、傣族、回族、汉族民众，在中缅商路上的小集镇蛮允，奋起抵抗英国陆军上校柏郎“远征队”的入侵，击毙了侵略分子马嘉理，打退了侵入我国边境的柏郎武装队。这一事件，是云南近代史上各族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第一次伟大壮举，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震动中外的帝国主义侵华事件。这次事件发生的背景是什么？以腾越地区为主的云南各族人民为什么要抗击柏郎“远征队”呢？“马嘉理事件”的后果和影响又如何？我们根据史料的记载，对腾越（今腾冲县）和蛮允（今盈江县芒允区）的抗英历史遗址作了考察，论述如下。

（一）

关于滇西边疆民众击毙马嘉理，打退柏郎“远征队”入侵事件发生的背景和直接原因，历来说法不一，在当地民间亦众说纷云。据当时的记载，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说法：

其一，是清政府官方的说法。这主要集中在清政府的钦差大臣李瀚章和署理云贵总督岑毓英等人的奏报之中。李瀚章、岑毓英等人说，马嘉理之被杀，系“山匪索过山礼”，只因马

嘉理首先开枪击毙“拦路行劫者”，而“匪众一齐上前将马嘉理及其宾从四人一并杀害”。至于柏郎“远征队”于二月二十二日被“山匪”、内地“汉奸”、回民“羽党”等约近二千人“三面合围，阻其去路”，也是因为“驮载甚多”“匪众复纠伙往劫”^①。李瀚章等人向朝廷的奏报，把滇西边疆民众保卫领土主权的反帝爱国斗争，诬为经济性的“抢劫”事件，这是他们企图搪塞英国人，为官府开脱责任而编造的拙劣的谎报。这种说法，有意无意地掩盖了事件发生的真正背景和直接原因。

其二，是英国官方的说法。英国驻北京公使威妥玛，在和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谈判中，坚持认定：“其根由在朝廷大吏均以攘外为心，所以李珍国是奉宪谕、岑毓英是奉旨”^②而行。威妥玛虽无任何凭据，却坚持把“追究罪责”的矛头，直接指向清政府及其所信赖的边疆大吏岑毓英等人，这明显的是以马嘉理事件为借口，用外交谈判为手段，对清王朝进行政治讹诈。显然，这个说法是英国侵略者故意掩盖英国当时急欲抢先侵入和控制中国西南这一重要的历史背景。其说法，当然不是发生马嘉理事件的真正原因。

其三，是一百余年来流传在腾冲、盈江、蛮允等地边疆群众中的说法。当地群众普遍传说：在马嘉理由上海抵达云南省城昆明时，云贵总督岑毓英前去迎接他，他却把一条小狗放在他乘坐的大轿上，让岑毓英躬身迎接到一条小洋狗。马嘉理以洋鬼子的傲慢态度，侮辱身任朝廷封疆大吏的行为，激怒了岑毓英，岑誓杀马嘉理以泄愤。在省城不便下手，乃布置下属官员，在马嘉理前往滇西的途中截杀他。这种说法，在滇西边疆一带流传极为广泛，几乎是众口一词，但显而易见，这是群众对“骄横”“恣肆”的洋鬼子任意凌辱我国同胞的极端愤恨之

说。这个说法，在当年的稗官野史中就有记载，据说，“马嘉理抵滇垣，谒总督岑毓英，欲用敌体礼，……毓英怒。……副将李珍国……请杀马嘉理及柏郎，毓英密札如议。珍国乃令其部将蔺小洪、杨大武谋于野人”^③。这仍然是当时的民间传说，并不是马嘉理案发生的真正原因。

那么，造成马嘉理事件的历史背景和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关于“马嘉理事件”发生的背景，据查办“马嘉理案件”的清王朝钦差大臣李瀚章的奏摺《查明英员马嘉理在滇被戕情形摺》的附件，《腾越绅众致李珍国原信二件》，其第一件原信说：柏郎、马嘉理之入侵，“查若辈垂涎我省，非一日矣，此来断无好意。其致一处，设天主堂以传教，设领事官以通商。蔓延既多，恣横日甚。”并提出，对柏郎、马嘉理等人“倘（若）借故逗留，欲传教、通商，即仿照河南、广西、湖南数省，聚众多人，围而鼓噪，责以大义，动以危言，使不能施其伎俩”^④。

腾越绅众致腾越镇左营都司、兼腾越城乡十八练都团总团首李珍国的原信，集中而扼要地说明了，腾越厅为中心的云南西部边疆民众之所以要反对柏郎、马嘉理“远征队”进入滇西，是深知英国侵略势力，久已“垂涎我省”，要防止侵略者以“传教”和“通商”为名，在滇西建立侵略据点，就必须采取预防侵略的措施，以保障边疆领土主权和人民生活不受侵犯，这就是腾越各族人民抗击柏郎、马嘉理“远征队”的背景和动机。

柏郎“远征队”武装入侵滇西，发生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当时的世界形势，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西方列强比过去更富有侵略性，而且“开始了夺

取殖民地的大‘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所以，毫无疑问，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过渡、向金融资本的过渡，是同分割世界的斗争的尖锐化联系着的”^⑤。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激烈地争夺原料和商品市场，疯狂地抢占殖民地。自从英国率先于1840年用炮舰摧毁了中国的固有防线之后，西方侵略势力潮水般地涌进了中国大地。它们对我国发动了多次侵略战争，“用战争打败中国之后，帝国主义列强不但占领了中国周围的许多原由中国保护的国家，而且抢去了或‘租借’去了中国的一部分领土。……割地之外，又索去了巨大的赔款”^⑥。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发动的多次侵略战争，都是以要求“传教”和“通商”为借口的，英国对我国发动的“鸦片战争”，以及英、法联合侵略我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都是借口其“传教”、“通商”受到阻碍而采取的行动，将其罪恶的“鸦片战争”一直称之为所谓的“通商战争”。

我们首先来看看西方侵略者的所谓“传教”是怎么一回事吧！

天主教和基督教是西方人普遍的宗教信仰，但在阶级社会中，它却成了统治阶级用以奴役人们的思想工具，马克思指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⑦。在西方殖民主义者向外扩张，掠夺殖民地和商品及原料市场时，“传教”又成了对外侵略的开路先锋。法国和英国侵入越南和缅甸等国时，其手段如此，当他们进而入侵中国时，也仍然如此。在我国清朝前期，是禁止洋教传入中国的，但有一些假“传教”为名的殖民主义冒险家，还是被西方侵略势力作为暗探而派遣潜入了中国；有许多“传教士”在我国各地秘密活动，为侵略者搜集情报。在鸦片战争中，天主教的南京主教艾维克就偷渡潜入英军军舰上，向

英国侵略军司令璞鼎查报告了他所刺探到的中国军事、政治情报^⑧。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接受英、法侵略者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和《黄埔条约》后，法国教会侵略势力就乘机将其在中国的“合法”地位，塞进了《黄埔条约》之中，该条约的第二十二款中规定：法国可以在通商口岸建“礼拜堂”、“医人院”、“坟地”，其礼拜堂与坟地倘若遭到中国人的“触犯毁坏”，中国地方官必须“照例严拘重惩”^⑨。1858年，英、法联军进攻天津后，强迫清政府和英、法分别签订的《天津条约》，就把洋教“合法”传入中国大地的“权利”，写进了条约的明文之中，该条约规定，对“耶苏圣教及天主教，……自后凡有传授习学者，一体保护”。“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凡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⑩。当时在华的传教士杨格非，于1858年7月30日，向他的英国本部派遣机关（差会）欢喜若狂地报告说：“中国出乎意料之外地对传教士、商人和学者开放了！这个国家事实上已落入我们的手中”。他以十分急迫的心情敦促各个差会和传教士说：“如果他们不去占领这块地方，不在十八个省的每一个中心取得永久立足的地方，那将是有罪的”^⑪。当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火烧圆明园后，在强加给清政府的《续增条约》（即《北京条约》）中，披着“传教士”外衣的法国侵略者，竟在条约中擅自加进了：听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条文^⑫。西方教会侵略势力，就是这样，既密切配合和帮助英、法侵略军打开中国的大门，又借助侵略军的洋枪大炮而狂暴地冲进了中国的内地和边疆。

本来就是为开拓殖民地，为侵华而潜入中国的一些“传教士”们，在取得了不平等条约所给予的侵略特权之后，就公开地、肆无忌惮地在中国广泛地展开以“传教”为名的侵略活

动,任意侵犯我国的领土主权。他们首先借口清还原有教堂,强指民房或公产为“原教堂”或“教堂旧址”,强求赔还。他们欺压百姓、凌辱官员,干涉内政,纵容和唆使一些“吃教者”为非作歹,这就激起了我国人民以至一些地方官员,出于义愤,起而反抗,而造成了一些所谓“震惊中外”的“教案”。实际上有些“教案”就是宗教侵略分子有意制造的,如1868年的“扬州教案”,就是英国“内地会”(总会设于伦敦,专门从事对中国内地传教的基督教差会之一)首领戴德生一手制造的。他依仗英国侵略势力,在扬州强占土地、建立教堂,激起当地群众的公愤,群起捣毁了戴德生的住所。戴德生通过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亲自出马,对当地官员施加压力,进行要挟,勒索了赔款,并迫使清政府撤换了扬州知府。戴德生攫取了他用“传播福音”的和平手段所无法获得的侵略利益。就在这一时期前后,以英、法两国为主的西方侵华势力,在我国各地制造了许许多多的宗教侵略事件,例如1861年的“贵阳教案”、1862年“南昌教案”、“衡阳教案”,1865年的四川“酉阳教案”,1873年的四川“黔江教案”等等,都使英、法宗教侵略分子掠夺了平时无法得到的侵略利益,使中国人民在政治上遭受屈辱,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受到严重损害。

在此期间,法、英宗教侵略势力大肆向我云南省各地进逼。远在1730年,法国天主教士就非法潜入了我省东北的盐津县,鸦片战争后,他们乘机在盐津龙溪设立了“主教公署”,向昭通、会泽、直至滇西的永胜、洱源、邓川等地扩张。英国“内地会”首领戴德生在后来总结他们的侵华经验时说:“现在在条约所给予的条件下,我们一手抓住护照,就可以很安全而舒适地由公路或江河到中国的任何一个省”,“在中国的广大土地下,蕴藏着最丰富的矿藏,……矿藏能使西方国家富

强”^⑬。这就是西方宗教首领们侵略中国的自供状。

正是由于英、法侵略势力制造的一次次“教案”，借以发动侵略战争，对我国进行最野蛮最残暴的掠夺的血淋淋事实，震惊和教育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危处英国侵略魔爪之下的滇西边疆人民，他们对此尤为敏锐、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所以，腾越地区各族民众，一旦“顷闻英国派钦差三员，由缅入滇，并由京派翻译官马嘉理赴缅甸交界迎接，不日即到腾越”，他们即预感到英国人“此来断无好意”，而决定“如马嘉理过境，即防护前进，”如果英人“藉故逗留，欲传教通商”，就仿照河南、广西、湖南等省的办法，召集民众出面阻止，使侵略者无法立足^⑭。于此可见，腾越地区各族民众的目的，是防止英国人以“传教”、“通商”为借口，在腾越建立侵略据点。因此，才决定阻止柏郎“远征队”进入腾越。

再者，我们又来看看英国所要求的“通商”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腾越绅民为什么要反对英国人来腾越“设立领事官以通商”呢？

英国从十七世纪中叶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后，在残酷剥削本国劳动人民的同时，就以“通商贸易”为手段，掠夺他国人民，进行资本原始积累，以发展其资本主义。“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⑮。英国从十七世纪初侵入印度，于十九世纪初完全占领印度之后，随即侵占了新加坡（1824年），并侵入了缅甸（1824年），接着就把贪婪掠夺的魔掌伸进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英国资产阶级一开始就把中国视为他们可以掠取最高利润的最大市场，他们认为：这个市场一经打开，“英国货在那个市场上的销量将比其余全部世界的总销量还要大”^⑯。但出乎英国资产阶级的意料，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英国商品在中国的销售，远非他们想像的那样美妙。

直至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对英国的贸易始终保持出超地位，每年盈余白银二、三百万两，英国资产阶级不得不付给中国大量白银以补偿贸易逆差。英国资产阶级为了达到掠夺中国的目的，竟卑劣地把毒品鸦片输入中国，以攫取最大限度的血腥利润。英国人就“为鸦片走私的利益发动了第一次对华战争”^⑦，用大炮迫使清政府接受了第一个不平等的《南京条约》，接着是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侵略性的不平等条约相继被强加给中国，英国割占香港、葡萄牙强占澳门，开五口通商，使中国门户洞开，而协定关税、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等一系列条款，使中国的独立和主权遭到严重破坏。鸦片被大量输入，造成中国白银巨额外流，市场银贵钱贱，中国人民陷入了深重的灾难之中。马克思指出：鸦片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⑧。到此，中国人民都知道了英国人要求“通商”的含义和性质。

英国人用炮舰冲开的中国市场，并不能在“自由贸易”方式下同时容纳英国的鸦片和工业品的倾销，中国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并不需要英国的洋货。于是，英国资产阶级决心继续摧毁中国对英国商品的一切防线。1857年，英、法即联合对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洗劫了广州，再陷天津，并在帝俄和美国支援下，迫使清政府分别和英、法、俄、美等国签订了《天津条约》，规定：外国公使驻北京；增开通商口岸；外人在华自由游历、传教、通商；长江自由通航；给英国赔款四百万两、法国二百万两。侵略者仍不满足，借口进北京“换约”，进而攻陷北京，对北京进行了毫无人性的野兽般的烧杀淫掠，纵火烧毁了举世罕有的最壮丽的宫殿圆明园。迫使清政府签订《续增条约》（即《北京条约》），除承认《天津条

约》的全部条款外，增开天津为商埠，允许贩华工出国，割九龙（司）给英国，对英、法赔款各增加为八百万两。俄国趁火打劫，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美国则根据中英、中法条约中的利益“一体均沾”条款，享有与英、法同等的侵华权益。

英、法侵略者对中国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及其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丧失了独立，陷入了灾难深重的半殖民地深渊。

腾越边疆各族民众，正是由于英、法侵略者要求“通商”，而不断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强加给中国一系列的掠夺性条约之后，才深恐英国人来腾越“设领事官以通商”。然而英国侵略势力，也正是为了要把进一步的侵略目标，集中到印度、缅甸和中国大陆的结合部——中国西南地区，力图开辟由印度、经缅甸，而深入中国西南，以达中国内地的掠夺性商路，修筑连结印度——缅甸——云南——四川的铁路干线，以大大缩短它由英国本土和印度，经海路绕马六甲海峡、南中国海而进入长江的漫长的运输线。为此目的，英国侵略势力有计划、有组织地对我国滇、川、藏地区，进行了大量的“游历”、“探险”、“武装探路”等等间谍侦察活动。1858年，英国侵缅军军官斯普莱提出了修筑从缅甸马达班（毛淡棉）到云南江洪（景洪）铁路的计划，受到英国议会的重视，并于1867年进行了线路勘察，因发现工程技术上无法解决的困难，才放弃了这条线路计划。1868年，英国军官、英国驻缅都瓦城专员斯来登，率领武装“探路队”进入云南西部地区，他们在回民起义军控制的腾越，进行了广泛刺探我滇西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的活动，曾诱惑回民起义军投靠英国，企图煽动起义军分裂中国。斯来登提出了修筑八莫——腾越——大理铁路，

以代替“斯普莱铁路”的计划。这一计划又受到英国政府的极大重视，并为此而对我滇、川、藏地区进行了更广泛深入的侵略性侦察。1869年，英国资产阶级在印度和上海的两大商会组织（即垄断着印度经济的和侵入我国上海的两大侵略势力）又派遣冒险家枯泊率领“考察队”，进入我国四川西南和云南西北部地区，进行了深入的侵略性侦察。枯泊的侦察报告，受到英国的印度殖民当局和英国资产阶级的特别重视，印度殖民政府外交部次长专门为其报告——《商业先驱者的游记》写了序言，大加赞扬。枯泊的报告提出了：“八莫与大理商路开通之后，云南人必输出土产品，与仰光入口之纺织品交易，但并无害于四川之商务（按：指上海英商集团之利益）。设使中国政府被诱胁而允许辟重庆为自由商埠，则可以重庆为中国西部之中心，再加以求水陆交通之便利，则沿路之农产及矿产，均可予取予携”。枯泊进而提出：“西藏每年由四川输入之团茶，约值六百万镑，而以金、银、羊及羊毛货、皮毛货，药材等为兑换。此项利权甚巨，……不能不设法夺之于中国人之口，即英国政府不能不积极运用政治手腕，使印度茶在西藏行销，以代替华茶也”。“由上述结论：则开通西康^①商路之关系，其重要可知。盖此路一面可连通八莫、大理之铁路，以控制云南，一面又可打通四川与扬子江上游英国商业之势力范围，取得连络；同时又可垄断西藏之政治、经济也”^②。

由于英国侵略势力对我云南、四川、西藏地区步步进逼的一系列“游历”、“探路”等等侵略性侦察活动，这不能不引起中国西南人民、特别是和印、缅相邻的滇西各族人民的严重忧虑，因而才提出了保卫边疆领土主权的要求。这就是以腾越为中心的滇西各族人民反对柏郎“远征队”武装入侵滇西边境的历史背景和真正原因。

(二)

英国资产阶级侵华势力，为了实现斯普来、斯莱登、枯泊等侵华“先驱者”提出的赤裸裸的侵略计划，“英属印度的政府，……于1874年，又派遣了柏郎上校率领下的第二次远征部队。……由黄河新道的勘探人伊利亚斯（Neyetias），和外科医生兼博物学家安德逊博士（John Ander—Son）协助，……包括有十六名采集人和杂役，以及由十七名印度塞克教徒和一百五十名缅甸人组成的一支警卫队。……所有属于这个远征队的人数为一百九十三名”^④。柏郎“远征队”计划从缅甸曼德勒出发，经八莫，越过中缅边界，进入中国云南腾越地区。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根据英国政府的指示，为配合柏郎的侵略性侦察行动，向清政府总理衙门谎报说有三名英国人由缅甸入滇“游历”，请发给护照，同时就派遣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翻译员马嘉理（A·R·Margary）前往中缅边境接应。1874年8月，马嘉理由上海出发，沿长江西上，经武汉、湖南、贵州、昆明、大理等地，于1875年1月到达腾越。

马嘉理在途经我国内地时，“因阴图川、滇山川，在道颇不循轨度”^⑤。有刺探我国内地情报之嫌，引起当地人民和官府的关注。马嘉理到达腾越时，擅自深入城郊险要关隘叠水河，竟绘制地形图和拍摄照片。腾城绅众见其行为有草绘军用地图之嫌，即向城内报警，群众闻警而至者数百人，人们把马嘉理团团围住，喝令其交出照片。马嘉理自认理亏，只得搪塞说还未拍下照片，被迫离开了叠水河^⑥。腾越总兵蒋宗汉、腾越厅同知吴启亮等官员见形势不妙，畏众怒难犯，立即派兵把马嘉理迅速护送出境，经南甸（今梁河）、干崖（今盈江）、蛮允前往缅甸。“自马嘉理赴缅甸后，道路纷纷传言：有洋人

数十，将来腾设立洋行。又闻有洋兵二、三百人，携带军火，欲藉通商为名，袭据腾城”^②。

我滇西腾越地区各族民众，刚刚经过回民起义和清军镇压回民的十多年战火蹂躏，因而，当听到“洋兵二、三百人，欲藉通商为名，袭据腾城”时，都十分惊惧不安，深以再次遭受战争灾难为忧。即由地方绅士掌握的自卫武装组织——腾越城乡十八练总团名义，召集会议，商讨保境安民的自卫办法。他们决定“齐团”设防，即分别集合十八个练（相当于后来的乡、保区划单位）的民众武装，实行武装保境安民。同时立即通知在边境前线巡视的总团首领李珍国（李时任腾越镇左营都司，副将衔参将），要他迅速回到腾越城，主持十八练武装齐团事宜。他们在通知李珍国的紧急信中写到：“刻下因洋人由缅入腾之事，合腾衿民酌议，于本月初六日，共联总团，众心一齐，以御外侮而安百姓。”“今特商定月之初六、七日，合厅齐团，相约七司（按：指边境七个傣族土司），联为一气，使外匪无从得入。”“洋人入境之患，伊等此来，其心莫测，若非事先预防，较之‘发匪’（按：此系当时官府和地方绅士们，对属于太平天国反清性质的云南回民起义军的诽谤之称）更甚万倍。”“务祈阁下定于初六、七日前来会团，预为防备，以固梓乡。此事关系紧要”^③。

正在腾越地区南部边境前沿巡边的李珍国，得到腾越绅众的紧急通知后，对可能发生的外敌入侵，立即作了防范部署。他召集腊撒、陇川、章凤（今陇川县境）等沿边的景颇族头人、山官，用“刀标木刻为凭令”，又令沿边各傣族土司“出具印结”，于各要隘防堵洋兵入侵，他为了“桑梓之邦数万生灵起见，昼夜筹划，费尽心力，断绝阴谋大患”^④。

从上述史实可以看出，腾越城乡十八练总团的设防部署，

李珍国动员景颇族、傣族在边境布防，都是为了保卫祖国领土主权、保障边境人民的和平安宁，是正当防御性措施，这是一个主权国家的爱国人民神圣的自卫权利。清王朝的地方官员也承认：云南腾越地区百姓在遭受十余年战争灾害之后，“正欲休养生息，忽传洋人来腾通商，洋兵来占腾越之说，激于义愤，聚而防堵，自系实在情形，……无非为保卫疆土起见”^②。

柏郎、马嘉理在缅甸八莫会合后，由马嘉理带领柏郎武装“远征队”，在根本不事先知照我当地地方政府的情况下，就非法越过中缅界河南滨江（红蚌河），侵入我国境内。当柏郎“远征队”在侵犯我国边境时，虽一再听到我国边民已有保边自卫的准备^③。却故意藐视中国人民的自卫权利，由马嘉理率领少数武装人员，于光绪元年正月十二日（1875年2月17日）悍然闯进我国境内三十余公里的腾越厅辖南甸（今梁河县）土司属地蛮允街（今盈江县芒允街），住入当地佛寺内。经刺探我边境军民动向之后，于二月二十一日，返回接应柏郎“远征队”。当马嘉理行至蛮允南边两公里的蚌屯冲（傣语，意为“红木树坪”），临近户宋河边时，受到我景颇、汉、回、傣各族边民一百余人的盘问与阻止，劝其不得带洋兵入境。马嘉理态度极端横暴，气焰嚣张，竟首先开枪杀害我边民，激起了我在场边民的无比愤怒，大家一致奋起反击，用刀、矛、棍棒将马嘉理及其帮凶兵丁四人当场击毙。

柏郎率领其“远征队”正规军165人，附以辎重及辅助人员，共193人。随马嘉理之后，相距一日跟进，于二月十八日越过国界南滨江，侵入我国境内，二月二十一日，进至蛮允以南约十五公里的崩洗山（又写为“班西山”）下的雪列寨。我爱国边民在反击并消灭了凶相毕露的侵略者马嘉理以后，随即